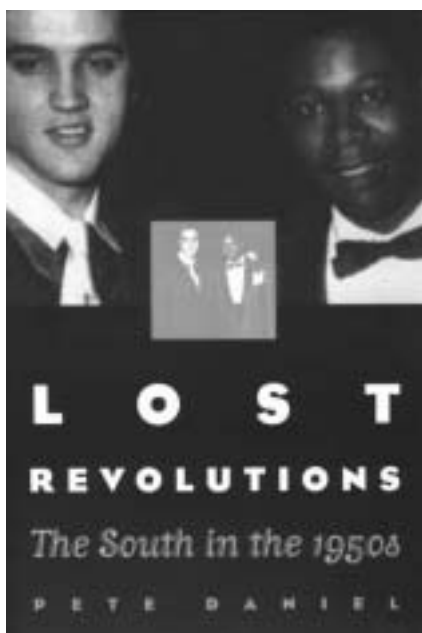


革命的發生沒有規律

● 孫傳釗



Pete Daniel, *Lost Revolutions: The South in the 1950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今春正在重溫阿倫特 (Hannah Arendt) 關於教育的論述的時候，偶然讀到美國南部歷史學會副會長丹尼爾 (Pete Daniel) 的《失去的革命——50年代的南方》(*Lost Revolutions: The South in the 1950s*)。該書的第三部分「致命的分裂」(Fatal Divisions)，運用各種史料對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 (Little Rock) 事件作了翔實的記敘。史學家丹尼爾對全

書的構思、敘述那一年代美國南部歷史的旨意，對於廣大中國讀者來說可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筆者注意到近年來海內外中國學人非常關注「告別革命」命題的爭議，所以我想：簡單地勾勒該書整體的大意，介紹丹尼爾的寫作構思與歷史分析，可能對讀者思考今天中國社會的走向、預測各階層政治立場的分化和演變會有一定的啟發。

該書第一部分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50年代美國南方社會「保守的穩定」的神話被打破了，社會處於大變革一觸即發的態勢。原因是南部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經濟向資本壟斷型的農業經濟轉換。40年代至50年代美國南部社會的變化，與半個世紀後發生在中國的社會變動有着既類似又相異的景象。一方面，因為政府農業政策推廣使用農業機械、化肥和農藥等各種現代技術，而這些現代技術的採用須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在競爭中生存下來，資本的集中和壟斷，迫使南部個體農民，特別是在貸款、接受技術教育和培訓方面均處於不利地位的黑人農民，不得不離開這一世代相傳的行業，至50年代末，南部有一半的農業經營者放棄了這一傳統產業；另一方面，經歷了長期蕭條

《失去的革命——50年代的南方》第一部分描述了二次大戰後美國南部社會「保守的穩定」的神話被打破了，社會處於大變革一觸即發的態勢。原因是南部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力密集型的農業經濟向資本壟斷型的農業經濟轉換。40至50年代美國南部社會的變化與半個世紀後中國的社會變動有着既類似又相異的景象。

在1950年代的美國，唯一明確表示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政黨只有共產黨。南部各行業，只有極少數白人知識精英批判種族隔離政策，多數派為了維持種族隔離制度，不遺餘力地進行抵抗。此外，在50年代產業轉換、人口向城鎮移動的過程中，許多社會底層的白人希望有人處於比自己更低的社會地位，感到有色人種是競爭對手，所以也激烈地捍衛種族隔離制度。

的農民，在40年代戰爭時期為充滿活力的軍需工業所吸引，開始大量流入城市，引起農業勞動力不足，提高了農業工人的工資，成本提高進一步促進了農業資本的集中和壟斷。大量農民從農村進入城鎮，從城鎮進入大城市後，城市人口驟然膨脹，出現了各種社會問題，如住宅、公共交通、新市民下一代的教育機關不足，以及都市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對流入都市的、出身南部農村底層社會的不論白人還是黑人充滿了鄙視，從而導致階級對立、衝突等，其中最難解決的社會矛盾是種族隔離、種族對立問題，這一問題不僅發生在就業場所，而且在所有公共社會生活上都有所反映。

丹尼爾以“lost revolutions”為書名，說明他對當時南部社會產生的新階級和種族對立會帶來有更大社會變革寄予希望，“revolutions”用複數來表示，說明他認為應該有不只一次的變革機會，認為這一時期是發生革命的好時機，期待會有這樣的可能性。但是，歷史表明這樣的革命並沒有發生。當時在南部對種族隔離、種族歧視發起最有力挑戰的，不是宗教團體，而是戰時已經不分種族將就業者統一起來對付共同對手——經營者——的、維護自己權利的工會組織：產業工會聯合會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而唯一明確表示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政黨只有共產黨。但是，50年代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使這兩股反種族隔離社會力量不能聯合起來，各自處於孤立狀態，在反共的意識形態之下，產聯拒絕共產黨員加入其所屬工會。南部各行業，只有極少數白人知識精英批判

種族隔離政策、呼籲社會變革；無論是政治界、實業界、教育界、宗教界，都是激烈的種族主義者佔據了主流社會的發言權。極少數白人精英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挑戰，在絕大多數白人保持沉默的情況下以失敗告終。白人精英的多數派為了維持種族隔離制度，不遺餘力地進行反動的抵抗，最典型的事例是1954年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局案」中，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違反憲法後，南部一百名議員聯署抗議書抵制判決。丹尼爾認為絕大多數白人對種族主義或支持或沉默的首要原因是：在50年代產業轉換、人口向城鎮移動的過程中，許多社會底層的白人內心對改善自己的生活、提升階層和社會地位寄予幻想和希望，所以總希望有人處於比自己更低的社會地位，這種幻想和希望決定了他們對種族隔離政策有一種親近感。所以激烈地站出來捍衛種族隔離制度的「積極份子」，不僅有白人精英，也包括許多下層社會的白人，他們感到有色人種是競爭對手，是對他們地位上升的威脅。丹尼爾認為，若論失去變革的諸多機會的責任，在於追究南部大眾的、特別是南部精英的良心。這一點也是對當今中國知識階層的警示。

如果第一部分是敘說、分析白人群體對革命的責任的消失，那麼，在書的第二部分裏，丹尼爾就是在敘述、分析激烈的種族矛盾和衝突並沒有導致革命的第二個主要原因：來自南部底層社會群體、特別是黑人群體內部的因素。出身於南部底層的人，不論白人或黑人，在共同的生活歷史中形成了一種共同的勞動階層文化：音樂、俗語、

服裝、社會交際方式等等，即使白人也很難在日常生活娛樂中劃清種族的界線。50年代南部低層社會大眾文化也被商品化迅速普及、融入主流文化過程中，這種大眾文化原有追求自由、具有反抗性的野性逐漸變質、被消磨掉了，模糊了其本來分明的種族對立的界線。另一方面，大眾文化形成的過程也是經濟繁榮、物質生活改善的過程，在這一個過程中，也有一部分出身底層的人們，忘記了自己先前的社會地位和處境，也模糊和削弱了人們對種族隔離政策和種族隔離主義信仰的正確的判斷力。該書敘述了50年代起美國南部興起的兩大大眾文化的演變史：一，南部人出於其自然的野性，對汽車速度有一種執著的追求。隨着汽車的普及，50年代起用普通汽車進行比賽(stock car)的流行，今天也成了美國中產階級娛樂的一部分；二，源於黑人表達憂鬱情緒的音樂布魯斯(blues)和50年代同賽車一起流行的狂熱的搖滾樂(rock'n'roll)，乃至70年代開始流行的靈魂音樂(soul music)，都在商品化消費過程中失去它們原來的種族文化特徵和自由、反抗的精神本質。這是他們喪失鬥爭精神的原因。

阿倫特關於教育的諸論述是難以讀解的、也是引起人們爭議的一個領域，特別是1957年小石城發生白人暴力事件之後，她發表〈關於小石城事件的思考〉(“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一文，提出了不同於提倡「融合教育」的公民權運動主流的觀點。有過納粹時代被徹底邊緣化——經歷過「賤民」(pariah)切膚之痛的她說：如果我是一個黑人母親的話，會感到最高法院的判決會

使自己處於比以前更加屈辱的位置上。她的觀點馬上引起很大的爭議和衝擊。因為公立高中實施的種族整合制度——「融合教育」，也是其後60年代聯邦政府「向貧困開戰」的社會改革諸政策的一環。然而，我們讀了該書第三部分後會感到阿倫特的思考有難得的精到之處。進入前白人中央高中的九位非洲裔學生並非真正幸運，儘管政府派聯邦軍隊駐校保護他們免受威脅和騷擾，但他們還是受盡了白人同學的侮辱甚至暴力威脅。半個世紀後，其中的一員艾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表示：自從走進那所學校後，她的生活就沒有輕鬆過，對此很是失望。多年後，為保持校區之間不同種族學生的平衡，她的一名孩子還被送到十英里外的學校上學。當時人們最渴望的是有朝一日能實現學校的種族融合，現在更嚮往的則是黑人能擁有自己的學校。「融合教育」不是公民權運動中的唯一潮流，黑人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擔心自己的文化被白人同化，因而主張種族之間積極分離的立場。阿倫特傾向這種立場，她認為，現代社會中，少數種族應該不被佔支配地位的文化同化，保持與其他種族具有獨立對等的關係，從而達到社會、經濟、教育上的平等。她認為教育領域具有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兩重性，反對把公共領域的平等和同質性的平等混同起來。她批評「融合教育」法與行政的強制性，力爭要保護那種既能維持公共領域的多元性、複數性，又能保證社會領域中的同質性的自律價值。雖然她和公民權運動的主流觀點不一樣，但是，在自我實現和追求這一點上，

阿倫特在1957年小石城白人暴力事件後發表文章，提出了不同於提倡「融合教育」的公民權運動主流的觀點。她認為，現代社會中，少數種族應該保持與其他種族具有獨立對等的關係。事實表明，當時人們最渴望能實現學校的種族融合，現在更嚮往的則是黑人能擁有自己的學校。「融合教育」不是公民權運動中的唯一潮流，許多黑人也主張種族分離的立場。

雙方是一致的。積極主張融合的左派自由主義者無論多麼出於無意，卻在現實中切斷了黑人文化獨立發展的進程。要求增加黑人院校的呼籲被種族融合的趨勢給抵消了。「融合教育」的另一負面影響是：白人開始從城市遷移到郊外，加快了城市衰落，又使得白人工人階層開始反對自由主義的社會改良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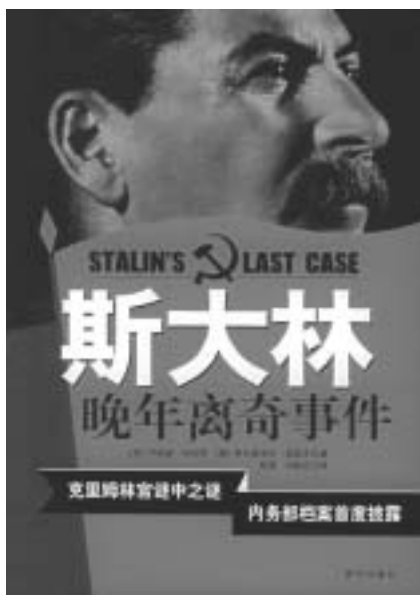
雖然丹尼爾用“lost revolutions”作書名，可是他心目中的“revolutions”內涵與我們一般漢語語境中的「革命」的內涵有所不同，在書的

末尾，他遺憾地說道：因為白人精英的反動抵抗，「破壞了社會環境和種族之間的關係，種族的融合不是出自人們的良心、也不是開明領袖努力的結果，而是來自於法律和訴訟，在人們心不甘、情不願的服從中形成」（頁305）。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所期待的、認為本來要發生的“revolutions”是源自人的良知，是在先覺的精英的引導下自覺地產生的人們觀念的變革。這大概與提倡「告別革命」的中國學人的意願是同樣的吧。

人性的地獄

● 沙 水

魯迅翻譯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揭示了十月革命後蘇俄政治生活中權力對人性的腐蝕。魯迅之所以譯這本書，未嘗沒有心懷對中國前途的擔憂。他早在《失掉的好地獄》中就表明了他對「革命」的黯淡評價：如果「革命」最終不能使人性得到解放，而只是使人性從一個地獄墮入另一個更壞的地獄，這樣的命，不革也罷。



布倫特 (Jonathan Brent)、諾莫夫 (Vladimir P. Naumov) 著，殘雪、鄧曉芒譯：《斯大林晚年離奇事件》(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記得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我唸初中的時候，俄語老師教我們唱了一首俄語歌，歌詞翻譯出來是：

斯大林和毛，在聽我們，在聽我們，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進、前進、前進！為廣大勞動，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幟下前進！

當時「三年困難時期」剛剛過去，饑餓的強烈感覺尚未忘卻，但每當唱起這首歌，我就感到一種自豪，一種光明和雄壯，覺得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在應和着歌的旋律，生氣勃勃地齊步行進在歷史的大道上。後來雖然這種感覺被中蘇論戰和「反修防修」破壞了，但一提起列寧和斯大林所締造的蘇聯，內心仍然有一種純潔的崇敬，包括後來在鄉下